



[宋元]再谈新安沉船

江静

来源:《海交史研究》2004年2期

投稿人:

发布时间: 2007-11-22

阅读次数: 907

1975年5月,韩国渔民在全罗道新安郡会岛防筑里前海捕鱼作业时,打捞出37件陶瓷器,这一发现引起了韩国政府及民间学者的关注。从1976年到1984年的九年间,韩国政府组织了“新安海底遗物发掘调查团”对该海域进行了十次发掘探查,打捞出一艘沉船残骸及大量遗物。围绕该沉船,韩国学者通过大量的调查考证,公布了有关沉船及其遗物的详细资料;[1]日本学界对沉船表现出了相当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沉船中发现的大量木简和陶瓷器,作了颇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我国学者也曾积极参与沉船问题的讨论,但是,研究焦点基本集中在沉船中发现的陶瓷器上,对沉船的国籍、港口、航路等问题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考察,可是,所得出的“新安沉船是十四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东亚及东南亚巡回贸易的中国商船”的结论却几乎成为定说。

我们认为,新安沉船的发现不仅可以证实中日文献中的有关记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对元代东亚贸易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可是,如果沉船的国籍、港口、航路等基本问题不搞清楚,其史料价值就无法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利用,而我国学界有关于此的上述定说又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中日韩三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厘清新安沉船的上述问题,这也是我们在沉船发现二十多年后,仍然把它作为问题进行讨论的理由。

一、沉船的国籍

关于商船的所属国籍,在1977年11月于韩国汉城举行的“新安海底文物国际学术大会”上,中日韩三国学者一度达成共识,即认为这是艘中国商船,主要依据有三:(1)沉船为中国所造,现已基本明确制造地是在中国泉州;(2)装载货物的木箱上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3)船上有中国制造的炊事器具及铜锣等物。[2]

然而,随着1978以后历次发掘的陆续进行,韩、日两国学者开始对上述结论产生怀疑,并最终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是艘日本商船。主要根据为1983年在沉船中发现的364枚被判定为货物标签的木简,其中,有49枚木简墨书“东福寺”、“钓寂庵”、“管崎宫”等日本寺社名,有47枚木简墨书“まこ三郎”、“とう二郎”、“衛門次郎”、“本とう二郎”、“いや二郎”、“又三郎”等日本人名,还有109枚木简上写有“纲司”字样,而“纲司”以及出现在木简中的“足”、“奉加钱”等字,显然又是日本汉字的用法,这就证明了船主和货主的日本身份。此外,沉船中还发现了13种32件日本制品,包括漆器、铜镜、刀等日本传统出口中国的商品,以及古濑户瓶、象棋、木屐等疑为船上人员的日用品。如果说这是艘中国商船,船上这些日本制品的出现难以解释。

对于韩日两国学者的意见,中国学者似乎并未接受。比如陈擎光先生就否定了新安沉船是日本商船的三个理由,[3]他认为,东福寺也有可能是高丽的寺院,留名木简的日本人可能是日本在高丽的侨民,而船中日本制品的出现恰恰说明这艘船的目的地不是日本,因为将这些东西从遥远的中国重新运回日本不合情理。在陈先生之后,笔者尚未发现有中国学者就沉船的国籍问题展开过讨论,“中国船籍说”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定说。例如,高荣盛先生在《元代海外贸易研究》一书中就提到,新安沉船是元朝驶往日本的商船。[4]

可是,我们以为,新安沉船是中国商船的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商船的产地不能作为判断商船所属国籍的绝对标准,日本商人完全可以通过购买或租赁的方式获得优质的中国商船,事实上,当时日本尚未完全具备制造远洋船的能力,来华的大型日本商船基本出自高丽或中国。

其次,根据木箱上的中国人名字判断沉船国籍的做法也不够科学,既然木箱中装载的是中国货物,箱上的名字就有可能是供应商的名字,况且,当时来华贸易的日本商人中有不少是居住在博多“唐人坊”的宋商后裔,他们拥有中国名字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日籍船上有中国式的锅勺等炊事器具及铜锣等物,也不难解释。可以肯定的是,船上有中国血统的人,根据为船上发现的具有中国人特征的人骨。所谓中国血统的人,此处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二是有中国血统的日本人。元代,有颇多的中国僧人搭乘商船赴日,仅见于史籍的就不少于13人。[5]此外,还有“好游”之邓克顺者“泛海东至于日本”。[6]另外,在元朝第二次伐日战役(1281年)中被日本人俘获而成为奴隶的南宋士兵中,一定有不少精通航海技术的水手,他们被利用为远洋商船卖力的可能性也极大。至于有中国血统的日本人,主要是指宋人的后裔,他们或是商人、或是水手、或是翻译。既然如此,船上出现中国式炊具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认为，沉船应该是一艘日本商船。除了韩日学者举出的上述理由，一个很重要的根据是，在元日贸易的舞台上，唱主角的始终是日本商人。笔者曾作过统计，往来于元日间、国籍明确的26次商船均为日本商船。中国船赴日的唯一记录是至正十年（1350）三月，在中国生活了46年的入元日僧龙山德见因“临老怀归”，赴太仓准备搭船回国，因“乡舟不至”，遂“雇倩小船一只，棹者施荣甫等十一人”[7]归国。可见，这唯一的一次赴日也不是为了经商。至于陈擎光先生在文章中提出的三条反驳意见，我们认为：（1）虽然高丽也有存在东福寺的可能，但此处的东福寺应该是在日本，因为它并不是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与其末寺承天寺的塔头钓寂庵，以及位于今福冈的筥崎八幡宫同时出现在木简的墨书中；（2）十四世纪前半期在高丽境内不可能有大量的日本人，首先我们没有在文献中发现当时日本人大批移居高丽的任何记录，而且从时代背景看，元日两国交恶后，高丽对日本人防范甚严，后者没理由在那种条件下移居高丽；（3）销售剩余的少量日本商品被带回国并不是超出常规的行为。

二、商船的组织

在明确商船的所属国籍后，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商船的所有人，或者说是派遣者到底是谁？对此，学界尚无定论。

可以肯定的是，该船与东福寺有关。今天的东福寺位于京都市东山区本町，始建于公元1239年。沉船中一共发现了41枚标有“东福寺公用”或“东福寺公物”的木简。此外，尚有5枚木简明确记有“钓寂庵”的字样。钓寂庵今已不存，当时乃博多承天寺的塔头。而承天寺又是东福寺的末寺。这就说明了新安沉船与东福寺有密切的关系。以川添昭二为代表的部分日本学者认为，这是京都东福寺为筹集重建寺院的资金而派遣的贸易船，理由如下：

第一，东福寺有派遣商船的必要性。元应元年（1319）、东福寺遭遇火灾，重建需要庞大的资金。按照当时的惯例，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幕府资助和寺领收益。然而，当时幕府财政已陷入困境，无力资助寺院重建，寺领收益的大部分也被武士地头扣留，很难筹集到所需资金。收益丰厚的海外贸易无疑是解决资金来源的最佳途径。

第二，东福寺有派遣商船的可能性。一方面，寺社造营船的派遣需要幕府的许可和保护。东福寺自建成后，一直受到朝廷和幕府的厚爱，东福寺历代住持中，有不少得到北条得宗的皈依，其中就包括在此次火灾后致力于东福寺重建的高僧南山士云（1254—1335）。另一方面，位于九州西北沿海的东福寺寺领肥前国彼[木+午]庄，是东福寺及北条一门对外贸易的有力据点，东福寺末寺承天寺又兼有对外交涉机能。综合上述因素，东福寺具有派遣造营船的极为有利的条件。[8]

以上推断应该说颇有道理，结合进入14世纪以后，幕府及寺社频繁派遣寺社造营船的背景，[9]新安沉船为东福寺造营船的可能性似乎相当大。

然而，问题是，在发现的364个木简中，明确标有货主名的木简是271个，其中，出现“东福寺”字样的木简仅占15%，即41个，标示铜钱总额为45贯。如果是东福寺为筹集资金而主动派遣的商船，木简数及铜钱数是否都太少了些？与此相对，标有“纲司”的木简比例为41%，有109个，这就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纲司在这艘沉船中所处的位置。

在中国文献中，我们未发现“纲司”一词的用例，应该是日本的独特用法。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纲司”一词最早出现在福冈市博多区出土的一枚黄釉牡丹文铁绘盘的底部，[10]此件黄釉盘是12世纪前半期的作品，由此可知“纲司”在日本出现的最迟时间。至于日本文献中“纲司”一词的最早出现，龟井明德先生认为是在《中岩月和尚自历谱》中，其中这样写到：“予十九岁，起圆觉到博多，欲出江南，纲司不许，上舶而归”，[11]说的是圆月和尚在文保二年（1318）从镰仓圆觉寺赶至博多，欲搭乘商船赴中国，遭到了纲司的拒绝。在与沉船年代接近的《天龙寺造营记录》（1341年）中，也记有：“宋船两艘事，作为该寺营造经费而批准，应令纲司早作准备，以便明年秋日放洋。”[12]日本《国史大辞典》对“纲司”一词的解释为“中国宋元时期的贸易船纲首。”

宋代，中国商船频繁进出日本，他们以博多为据点，率领商船在宋、高丽、日本三国间从事贸易活动。为了在异国他乡获得领地、取得保护，他们往往归附朝廷或幕府的权门势家及大寺社，于是，纲首的贸易活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至少在形式上，贸易的主体成了他们所依附的寺社及权势之人。有学者称这种贸易形式为“权门贸易”。[13]

新安沉船中标有东福寺“公用”或“公物”与纲司“私”两类木简的出现，揭示了纲司所具有的双重身分：既是受东福寺派遣，为东福寺营利的“商使”，又是以自己的资金从事买卖，为自己谋利的私商。因此，新安沉船的实际船主很可能就是归依东福寺或其末寺承天寺的纲司，东福寺只是名义上的派遣者和保护人。无论东福寺是实际的派遣主，还是名义上的派遣人，寺院参与海外贸易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后来寺院积极参与幕府对外交涉及海外贸易活动的前奏和铺垫。

除了“东福寺”、“钓寂庵”和“纲司”，木简中还发现标有“筥崎宫”字样的木简3枚，标有普通日本人名木简47枚，标有僧侣名的木简29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新安沉船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筥崎宫是指位于今福冈市东区箱崎的筥崎八幡宫神社。至今，它仍因奉有海神和商业神受到人们的参拜。发现的三枚木简中，两枚正面写有“拾贯文教仙 劝进圣”、背面写有“筥崎奉加钱”，剩下的一枚正面写着“圣教仙（？）皮”、背面写着“筥崎奉加拾贯”。劝进圣是指为建造及整修寺社和佛像，游说人们捐献财物之人，奉加钱则指奉献给神佛的钱款。对此三枚木简所记的奉加钱，一种意见认为，可能是名为教仙的人为祈求航海安全、贸易成功而向筥崎宫捐献的钱；[14]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筥崎宫在延庆三年（1310）曾遭受过火灾，这是筥崎宫的神职人员教仙通过海外贸易筹集整修筥崎宫的资金，筥崎宫是新安沉船的货主之一。[15]无论作何种推测，可以肯定的是，奉加钱的来源与海外贸易有关。

记有明确为日本人名木简有47个，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们应该是参与贸易的中小商人。至于参与的形式，或是出资委托纲司交易，或是亲自随船来华贸易。

另有29个木简墨书着僧人的名字，这些僧人有两种情况，一是随船赴日的僧人，可能是元僧，也可能是回国日僧，

我们知道，元代两国僧侣往来是甚为频繁的，而他们唯一能够搭载的交通工具就是商船；二是东福寺或承天寺的僧人，为所属寺院采办货物、经营贸易。

三、港口与航路

关于新安沉船的始发港，目前较为统一的意见是在庆元，也就是今天的宁波，根据为以下三条：（1）沉船中出现了印有“使司帅府公用”铭文的青瓷碟，此处的“使司帅府”当指大德七年（1303）由金华迁至庆元的“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2）宁波于1978年在宋元市舶库附近的东门口海运码头遗址中，出土了大批宋元时期的龙泉窑青瓷，这批青瓷与新安沉船中打捞出的青瓷器有很多品种是一致的；（3）沉船中打捞出—件刻有“庆元路”铭文的铜制秤锤。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前面提到的陈擎光先生就认为，使司帅府并非只在庆元，而仅凭—件铜权是无法认定沉船始发庆元的，根据沉船中瓷器的合理产地及运输路线来看，沉船的始发港应该是福州。

陈先生的分析颇有道理，从元日贸易的实际情况来看，福州也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例如，天历元年（1328）春，有日本商船泊福建长乐，[16]次年五月，有日本商船自福州返航。[17]可是，因此完全否定庆元港与沉船的关系又太过武断。

我们的意见是，沉船曾停靠过福州，在装载了陶瓷等物后，又驶向了庆元。当时，福州隶属江浙行省，而江浙行省专司海外贸易的唯一机构就是设在庆元的市舶提举司，沉船需要赴庆元办理—系列的出海手续，同时继续其交易行为。

关于新安沉船的预定航路，学界目前有四种观点：—种观点认为，沉船是以日本为目的地，途中停靠高丽的开城等港从事小规模的贸易活动，根据为沉船中发现的三件高丽青瓷；第二种观点认为，沉船从庆元出发，横渡东海，经肥前松浦郡值嘉岛（今平户岛及五岛列岛）抵博多，这条航线是中日商船往来的主要航线；第三种观点认为，沉船是—艘“回游”性质的贸易船，即从庆元出发后，—路驶往高丽、日本、冲绳、菲律宾，最后回到庆元，根据为沉船中发现的白瓷铁斑文瓷器在日本没有出土，在菲律宾却大量出现；最后—种观点认为，商船的目的地就是高丽。

上述四种观点中，支持第—种观点的人现在已不多见，因为这三件11-12世纪的古董青瓷器很可能是在中国就被装上了船，作为根据的理由不够充分；第二种观点在韩日学界比较流行，他们对商船在高丽附近海域沉没的解释是：商船遭遇环流被冲到了现在的位置。在这条航路上，常有商船遭遇海流被吹到当时的耽罗，也就是今天的济州岛—带，例如，日本嘉历元年（1326），从元返航的日本商船在高丽耽罗附近海域触礁，以相模国龟峰远上人为首的七十余人上岸寻求柴水，遭岛上居民袭击。[18]第三种观点是中国学者的普遍认识。然而，我们无法在文献中找到中国商船在东亚巡回贸易的记载，而日本商船当时尚不具备巡回贸易的能力，在明确商船为日本国籍以后，—观点也难以成立；第四种观点应者寥寥，因为他无法对船上出现大量与日本有关的物品作合理的解释。

我们认为，元日之间除了横渡东海的传统航路，还存在着另—条取道高丽的航线。[19]这条航路为：自庆元出发，经定海过普陀山、蓬莱山（今大巨山）入白水洋（长江海口以南、钱塘海口大小洋山以北海面），过黄水洋（淮水入海附近海面）后，横渡黑水洋（今江苏之东，山东半岛之南与东以及朝鲜半岛西—带黄海深洋）至夹界山（今小黑山岛），经五屿（今大黑山岛西南五小島）、黑山（今大黑山岛）、月屿（今前后曾岛）诸岛沿海岸线北行，至礼成江入海口，沿途在高丽诸港进行贸易活动，最后再沿高丽西南海岸线南下，穿过高丽南端的济州海峡，东行至对马、壹岐，抵博多。商船寄港高丽的理由无疑是出于贸易的需要。

由于新安沉船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在这条航路上，而且，沉船中发现的高丽制品不只是三件高丽青瓷，还包括断面六角形的铜箸、铜匙、铜制投壶和高丽镜，因此我们认为，沉船在驶往日本之前，是在高丽进行过贸易活动的。

综上所述，新安沉船是十四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庆元驶往博多的日本商船，途中曾在高丽进行过小规模的交易活动，在离开高丽不久后遇难。

本课题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2年度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注释：

[1] 尹武炳等编：《新安海底遗物》（资料篇I、II、III、综合篇），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1983—1988年。

[2] 龟井明德：《日本陶瓷贸易史的研究》，第185页，同朋舍，1986年。

[3] 陈擎光：〈元代福建北部及其邻近地区所输出的陶瓷器—试论新安沉船以福州为出口港〉，见张炎宪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89年。

[4] 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第9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408—410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6] 《申斋集》卷11《元故三公府掾邓克顺墓志铭》。

[7] 《圆太历》，转引自上村观光编纂《五山文学全集》（别卷），第1110页，思文阁，1973年。

[8] 大隅和雄编：《镰仓时代文化传播的研究》，第301页—330页，吉川弘文馆，1993年。

[9] 明确为14世纪前半期派遣的寺社造营船有：1、1325年来华，翌年回国的建长寺造营船（《广濑文书》《比志岛文书》）；2、1326年归朝的胜长寿院造营船（《比志岛文书》）；3、1330年派遣的关东大佛造营船（《金泽文库古文书》）；4、1332年派遣的住吉神社造营船（《摄津住吉神社文书》）；5、1342年派遣的天龙寺造营船（《天龙寺造营记录》）。

[10] 同[2]揭书，第206页。

[11] 《续群书类从》（第九辑下）卷236，〈中岩月和尚自历谱〉，第612页，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57年。

[12] 同[5]揭书，第395页。

[13] 大阪大学文学部日本史研究室编：《古代中世的社会与国家》，第575—591页，清文堂，1998年。

[14] 冈内三真：〈新安沉船出土的木简〉，见《东亚的考古与历史：冈崎敬先生退官纪念论集》，第561页，同朋舍，1987年。

[15] 同[8]揭书，第305页。

[16] 同[11]揭书，卷236，〈中岩月和尚自历谱〉，第613页。

[17] 同[11]揭书，卷231，〈雪村大和尚行道记〉，第436页。

[18] 《广智国师语录》卷2《悼高丽斗死僧轴序》。

[19] 江静：〈元代中日通商考略〉，见王勇主编《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 第一辑》，第95—13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